

# 重庆通史

---

CHONGQING  
TONGSHI


周 勇主编



第一卷  
古代史

---

第二卷  
近代史(上)

重庆出版社 

# 重庆通史

---

CHONGQING  
TONGSHI

周勇主编

第一卷  
古代史

第二卷  
近代史(上)

重庆出版社 ▲

题《重庆通史》

爱国 团结 奋斗 奉献

杨尚昆

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 出版说明

—

《重庆通史》是1990年经中共四川省委同意,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的四川省“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本项目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与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共同申报,合作进行,并最终完成研究工作。周勇担任课题组组长。摆在大家面前的《重庆通史》,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

《重庆通史》是一部学术性通史著作。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重庆历史实际出发,以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公元前200万年的巫山人到公元1952年,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朝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的重庆历史。现在已经完成的《重庆通史》共3卷,54章,约115万字,分为两册出版。第一册,包括第一卷(古代史,公元前200万年—公元1875年,10章,约21万字);第二卷(近代史上,1876—1918,17章,约33万字)。第二册,包括第三卷(近代史下,1919—1952,27章,约60万字)。

二

通史是反映史学研究综合性成就的著作。城市通史是城市的

基础建设之一。当今世界各大城市无不以拥有高水平的城市史著作而自豪。完成重庆自己的通史,是重庆历史学界,特别是地方史学界的历史责任。

本项目 1990 年立项,2001 年完成,历时 12 年,横跨两世纪,是一部填补中国城市史、重庆地方史研究学术空白的著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庆地方史研究深入开展的必然结果,是 20 年来重庆地方史学界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是重庆文化的基本建设和重要组成部分。

1978 以来的 20 多年里,我国区域地方史研究蓬勃兴起。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全国同行,特别是四川同行和重庆地方史学界的共同努力,重庆地方史研究工作蓬勃发展,成果累累,共出版有关重庆历史的著作 701 部,发表论文、资料 8042 篇(见孟广涵主编的《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78—1988》、《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89—1998》)。这些论著全面地反映了重庆在古代、近代和现代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反映了这些时期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因而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地域大大扩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特别是通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专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断代史研究成果更加丰硕,人物传记与资料、译著大量出版,这就为撰写重庆通史性著作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由于这 20 多年来地方史学界的共同努力,编撰《重庆通史》的条件基本成熟。

在这个大发展的背景下,从 70 年代末开始,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携手合作,在重庆地方史学界老领导、老专家的带领下,从无到有,革路蓝缕,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粗后细、先专史后通史的办法,围绕重庆开埠、辛亥革命、大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打下了研究工作的基础。从 80 年代中期起,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与四川大学合作承担了国家“七五”期间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近

代重庆城市史》，从而把重庆地方史研究从以资料工作为主全面提升到在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专题研究并撰写专著的水平，完成并出版了《近代重庆城市史》，以及《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从而推动了重庆地方史的整体研究水平。从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重庆通史进行，合作承担并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市的重要课题，自主规划了一批课题。20 年来，我们编撰出版了著作 74 部、论文资料 500 多篇，初步形成了以通史为中心，以专史、断代史、人物研究为重点的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从而为《重庆通史》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正是有这 20 年研究的成果，我们才有可能来着手完成这部 115 万字的通史。而《重庆通史》的出版则是我们这 20 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20 多年来，由我们直接撰著、编著和组织编著的著作主要有（以出版时间为序）：

#### （一）通史类著作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该书是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是第一部带有重庆通史简编性质的著作。1992 年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二）专史类著作

《重庆开埠史稿》，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2 年印刷。

《重庆开埠史》，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出版社 1983 年出版，1984 年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周勇、刘景修译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三·三一惨案纪实》，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重庆城市研究》，隗瀛涛等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近代重庆城市史》，隗瀛涛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该书是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的终结成果，由四川大学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合作完成。该书 1992 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一等奖，1999 年又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个世纪的历程——纪念重庆开埠 100 周年》，重庆地方史研究会等编，重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由孟广涵、周永林、周勇等主编，共计 4 题 8 卷 500 万字。包括：《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重庆谈判纪实》（初版本和增订本）、《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续编）。由重庆出版社 1983 年至 1993 年出版。分获四川省、重庆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二、三等奖。

《国民参政会》，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 （三）断代史著作

《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1 年印刷。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周勇编著，重庆出版社 1986 年出版。1986 年获四川省、重庆市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重庆抗战纪事》及《续编》，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 1985、1995 年出版。1995 年获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优秀文史图书二等奖。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共 10 卷 310 万字，由西南各省区市政协协作完成，1986 年至 1995 年出版。1995 年获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颁发的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一等奖。

《重庆抗战丛书》，共 16 卷 337 万字，由重庆市政协牵头组织，重庆学者共同完成。重庆出版社 1995 年出版。1999 年获重庆市

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 (四)人物研究著作

《杨闇公日记》，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忆杨闇公同志》，刘伯承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邹容文集》，周永林编，重庆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周永林编，重庆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沁园春·雪〉考证》，周永林编，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3 年印刷。

《论邹容》，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杨闇公》画册，周勇主编，中共潼南县委 1991 年印刷。

《杨闇公纪念集》，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卢作孚追思录》，周永林主编，重庆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卢作孚研究文集》，凌耀伦、周永林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五)工具书

《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78—1988)，孟广涵主编，重庆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89—1998)，孟广涵主编，1999 年印刷。

此外，还举办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主要有：在重庆城市史方面——1989 年，重庆城市史研究学术报告会；1991 年，重庆开埠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1999 年，重庆城市史研讨会。在重庆近现代史方面——1981 年和 1991 年的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和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1990 年，卢作孚研究学术讨论会；1992 年，纪念杨闇公同志牺牲 65 周年学术讨论会；1996 年，近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学术讨论会等。



## 三

近 20 年来,在我国,区域地方史研究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这一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论著,设立了中国第一批地方史研究博士、硕士点,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地方史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地方史从“七五”期间开始便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予以资助。台湾学者也正在开展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说,中国地方史研究已走出了困境,形成了高潮。

在国际上,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国际学术潮流,美国、日本等国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地方史著作和资料。地方史研究的课题也十分广泛,凡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军事、民情尽在其中。在研究方法上也日趋多样化,有对一个县的微观研究;有对各大区域社会结构、框架的宏观研究;有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区域性、社会性研究,有不同学科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多学科研究,等等。研究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外国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选取中国地方史(包括四川史、重庆史)作为博士论文题材。仅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所接待和指导的美国、日本博士研究生迅速增加的事实,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外国学者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使我们对地方史的研究更加深入。

因此,我们可以说,《重庆通史》是在我国人民进行历史反思,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伟大进程中,在中国地方史研究成为一股国际性学术潮流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一研究成果也就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创新风貌的学术著作。

首先,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观点,把它作为研究重庆历史的途径和起点。同时又坚持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观点。在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始终把重庆放在中国西部的全局地位上考察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尤其注意重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注意发掘重庆历史的个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反映重庆历史的特色,从而摆脱地方史只是今日地方行政区范围内的中国通史缩微版的窠臼。

其次,在研究的整体思路上,我们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古代悠久而丰厚的历史积淀上,浓墨重彩地论述近代历史。重庆古代的历史从巫山人算起,已经有 200 万年了。无论是人类活动本身的内涵,还是跨越时空的长河,古代史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长度。正是因为如此,有些地方的通史仅古代一史就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把这 200 万年的历史浓缩为一卷,择其要而书之,取其精而用之,选其华而记之,只占全书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而把整整两卷和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用来浓墨重彩地描写不到 100 年的重庆近代史。这是因为,在悠远丰厚的重庆历史上,真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与今天联系最紧密,最能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还是近代以来的历史。重庆近代史,是一部从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的历史,一部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历史,一部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的历史。其间的苦难、奋斗、曲折、艰难、光荣、辉煌,……可圈可点,可感可叹。近代的重庆,为祖国奉献了灿烂的文化,也为自己打造了崇高的精神。

第三,在历史内容的选择和发掘上,我们努力改变通史只是政治斗争史的格局,而始终以重庆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始终注重发掘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原因。正是这种努力,使我们从重庆历史中抽出了反映重庆本土化特征

的三条互动发展的历史线索：一是政治发展的历史，即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开展的斗争，和劳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斗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重庆人民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即重庆由一个川东地区的军政中心，逐步演变为四川、西南、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了中国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形成演变的历程。三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即重庆作为内陆中心城市的文化源流，研究古代巴渝文化——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现代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各自形态、相互联系，以及文化与经济进程、政治发展的关系。

这种尝试的目的在于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在于显示《重庆通史》的独特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2年前本课题立项的时候，我们就提出，经济与文化研究的薄弱，是通史研究的普遍现象。对于重庆这个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来说，要搞清楚政治发展的历史已属不易，而要把城市经济与文化的演变理出个头绪，展示其形态，揭示其规律，就更加困难。因而在本书中，我们把200万年来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历程及其传承关系，既作为难点，也作为重点；这种研究既是突破口，也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本着这一理想，在“七五”期间，我们就开始对重庆经济进行整体性研究，1989年出版《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时，研究“经济中心”的内容已有4章，篇章框架已经形成；而“文化”则刚刚起步，有了一章“近代重庆文化”，但显得生硬。“八五”开头时，1991年出版《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经济、文化的研究大有进展，已经成为支撑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独立板块。而当进入“十五”，《重庆通史》完成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用40万字的篇幅来展示经济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成型，甚至可以说，一部

《重庆经济史》已经融合在一部《重庆通史》之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参加本书文化部分写作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刚刚放下写《重庆通史》的笔,又在相约写一部《重庆文化史》。应当说,是研究《重庆通史》的实践给了他们这种学术的眼光,也是《重庆通史》的成功,给了他们胆量与勇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说,12年前我们提出的问题已经作出回答,作出的承诺基本实现了。

第四,在历史分期上,我们始终以社会性质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这集中体现在重庆近代史的分期上。我们对重庆近代史的上限,没有套用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的说法,也没有提出一个简单标志。而是从重庆历史实际出发,把上限处理成一个过程,即1876《烟台条约》——1890《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重庆开埠。这样就更能准确地反映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关于下限,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以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我们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但在具体处理上,又不完全采用1949年说。我们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在重庆的结束,毫无疑问,1949年旧政权的崩溃是一个主要标志。但推翻旧政权还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部分,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才最终铲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必须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缺一不可。它们都是同属通史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民主革命任务彻底完成,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止,作为第三卷的终结。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地区的近代历史下限的做法,在国内外似乎还没有先例。这一学术观点提出至今已经12年了,得到多数同行的赞成。

在体例上,本书采用了通史与专题相结合、诸体并用的方法。全书主体以编年为经,以纪事为纬。在大部分章节里,将政治、经济、社会融为一体,体现了通史特点。同时,又分别在每一卷里设

置专门的章节来集中记载和分析重庆经济中心的演变、重庆文化的变迁,而且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而使本书具有浓郁的重庆特色。此外,本书采用了必要的图表,以方便读者,提高使用价值。

#### 四

与12年前申报并审批这个科研项目时相比,“重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97年设立了重庆直辖市。当此《重庆通史》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们要向读者作几点说明:

(一)重庆的地域发生了变化。12年前本课题立项时,重庆是一个经济计划单列市,在行政上隶属于四川省,辖21个区县(市),1500万人口,2.3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我们当时研究重庆通史的地域。而今天,重庆已经是一个直辖市,辖包括原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在内的40个区县(自治县、市)、3068万人口,8.2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地域已经从老重庆、小重庆,发展到新重庆、大重庆了。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我们曾经企图实现从写老重庆、小重庆到写新重庆、大重庆的跨越。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实现这个跨越决不只是量的扩张,更不是凭剪刀加糨糊就可以交差的。而必须老老实实地从搜集材料开始,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本的史实考订开始,必须认认真真地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方能着笔于通史这个神圣的事业。既然短期内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而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因此,我们决定一秉12年前立项时的初衷,先写老重庆,同时尽可能增加新重庆地域内的历史内容。因此,现在出版的《重庆通史》,是对老重庆、小重庆历史的一个交待,同时也包括了对新重庆、大重庆历史的回应。这就为今后修订《重庆通史》留下了历史的空间。

(二)通史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20多年来,我们对重庆的

历史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说,重庆史是一部以城市为核心的历史。城市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重庆的全部历史都建筑在城市的发展和演变上。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得以登堂入室,开始揭示出重庆成长的一些特殊规律;也正是对这些历史特质的把握,才有了我们这 20 年来的学术成就。这是我们申报并撰写《重庆通史》的“底气”。但是,重庆直辖改变了我们的研究对象。重庆的历史从以城市为主体的历史,变成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具有强烈反差的历史画卷。由于这一主体的变化,我们的具体研究对象,也就从以城市为核心而开展的具有浓厚的城市色彩的政治斗争(白区工作)、经济发展(经济中心)和文化进步(城市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农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红色根据地)、经济发展(农村经济)与文化进步(民族文化)的历史。而对后者(乡村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重庆地方史学界所欠缺的。再加上三峡库区考古成果层出不穷,而对它的研究,将会对重庆历史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都有待于《重庆通史》修订时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读者对象发生了变化。一部重庆通史,它应当属于全中国人民,也可以说属于全人类。但是,它首先应当属于全重庆,应当属于 3000 万重庆人民。老重庆的历史,老重庆人关注他。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新重庆、大重庆了,3000 万人都会在乎它,关注它。因此,作为一部“重庆”的“通史”,就理所当然地应当为 3000 万人所接受。由于我们研究不深,材料掌握不全,即使经过短期努力,拾遗补缺,也难免挂一漏万。为此,我们只能对读者表示歉意,这也更加激励我们加快对新重庆历史的整体研究,以更加完整、全面的重庆通史著作奉献给 3000 万人民。

(四)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正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已经完成的书稿,主要还是实现当年我们提出的研究计划的产物,是作者对重庆通史研究的阶段性认识。历史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业,需要

非常严谨的学风。我们将以《重庆通史》的出版为起点,把对重庆通史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这部《重庆通史》的下限只写到1952年,我们还将需要继续写下去。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写出一部完整准确地反映新重庆、大重庆历史全貌的《重庆通史》。

## 五

本课题组成员有:周勇、胡道修、饶亚、张瑾、王钟、胡大牛、文国伟、朱培麟、余凡、罗尚义、薛新力(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全书由周勇主持编写及统稿、定稿。张瑾参加了部分统稿工作。郭金杭负责全书的计算机处理与校对工作。王志昆、陈建智、谷明宇参加过前期研讨工作。

本书各章撰写分工是:

第一卷,10章,由胡道修撰写。

第二卷,由周勇撰写初稿,饶亚、张瑾、胡大牛、王钟先后参加写作。具体分工是:周勇、饶亚(第1、2、11、12、13、14、15章);周勇、张瑾(第3、4、5、6、7、8、9章);王钟(第10章);胡大牛(第16、17章)。

第三卷,由周勇撰写部分初稿,参加写作的有文国伟(第1、2、3、4章);朱培麟(第5、6、25、26、27章);余凡、罗尚义(第7、8、9、10章);周勇、王钟(第11、12、13、14、15、16、17、18、20章);余凡(第19、23、24章);薛新力(第21、22章)。

## 六

这部著作能够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交付出版,首先应当感谢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的老会长孟广涵同志、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永

林同志,现任会长徐朝鉴同志。20年来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与他们的倡导、组织和身体力行分不开的。12年来,他们给了我们课题组全体同志以很大的鼓励、支持和鞭策。

我们要感谢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隗瀛涛教授对我们的教导,也要感谢博士生导师何一民教授和谢放教授、王笛教授等师兄。从80年代初我们就跟随隗瀛涛先生研习中国近代史。“七五”期间又共同承担《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与撰写工作,创造出一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结构功能学派”。这部著作对于重庆地方史研究来说,具有奠基的意义。正是这部著作的撰写,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们的研究水平,也进一步鼓起了我们的学术勇气,萌生了撰写《重庆通史》的念头。也正是课题组共同创造的学术成就,成为了《重庆通史》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梯,成了我们学术成长的阶梯。

我们要感谢重庆市政协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这些年对我们的关心、支持、扶持和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重庆出版社,特别是李书敏社长的鼎力支持,感谢文史编辑室的同志们。

本课题组的工作,得到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志总编室、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的具体支持与通力合作。我们还得到了国内及日本、美国学者在资料方面的协助。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成果,还得到了许多学界同仁的热心帮助。

可以说没有上述单位、前辈、领导、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我们是不可能克服过去12年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终于完成这项跨世纪的学术工程的。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对《重庆通史》的编纂也关怀备至。1997年3月,他来



重庆出席杨闇公诞辰 100 周年、牺牲 70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特欣然为本书题词:“爱国 团结 奋斗 奉献 题《重庆通史》 杨尚昆 1997 年 3 月 31 日”。值此《重庆通史》出版的时候,我们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重庆通史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理论、资料准备都还不足。12 年中,我们既感到使命的庄严,更感到责任的重大,常常力不从心,因此,弱点和缺点在所难免。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是创新的地方,也还有待于读者的评价和实践的检验。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教,使我们共同以探索创新的精神去寻求历史的真谛。

伟大的时代需要历史科学,重庆的发展需要重庆历史的精品力作。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具有历史感,更应该具有时代感。研究城市历史的人,更应当与城市共命运。

作为一个重庆人,应当为重庆的过去而骄傲,为重庆的未来而振奋。我们应当继承以巴渝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和道德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应当发扬历史上重庆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和反压迫、反侵略的民主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正确地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更加勇敢地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重庆通史》的完成与出版,能够为此产生积极的作用。

《重庆通史》出版了,这只是一项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又标志着《重庆通史》这项更加宏伟工程新的开始。我们将秉承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在新的世纪里努力创新,为史学和文化的繁荣,为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出贡献。

周 勇

2001 年 8 月 26 日